

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高岭 □翟润卓 □唐昱茵——

经过 19 世纪的“革命世纪”，超时劳动在 20 世纪初露端倪后，在 21 世纪席卷众多国家，包括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超时劳动的现象普遍性和问题严重性迫切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不能区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蕴涵着深刻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榨取思想。本文首次系统地整合了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并通过对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思路。把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构建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模型，有望探索出与适度劳动强度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关键词：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劳动榨取模型；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2)07—0015—09

引言

工人的劳动强度问题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发展而日显突出。对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这样的事实：超时加班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甚至某些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也卷入了超时劳动的浪潮中。^[1]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安全和健康处于未来工作的中心：构建在百年经验之上》，世界上大约 36% 的劳动力人口工作时间过长，每周超过 48 小时。^[2]我国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超时加班”问题。根据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 年报告》，2016 年我国部分劳动者每周及上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 44.73 小时和 44.04 小时，工作时间为 50 小时或超过 50 小时的比例超过四成（按国际标准，周工作时间超过 50 小时属于“过度劳动”）。每月及上月工作时间为 29 天或 29 天以上的比例皆超过三成（分别为 33.16%，30.85%），超过一半（51.20%）的劳动者上一年工作 12 个月。可见，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略高于同期的国际平均水平。从长期来看，较长的劳动时间既不利于我国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因此，尽管超时劳动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但仍值得重视，要努力在现有的发展阶段适当降低劳动时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超时劳动这个问题，“健康中国战略”^[3]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4]的政策出台，有望为解决我国部分地区和企业存在的劳动强度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研究劳动强度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把看待劳动强度的视野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1C10384087）；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有企业生产组织创新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20720221030）

作者简介：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翟润卓（通讯作者），牛津大学经济与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唐昱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微观个体和企业转向宏观经济增长层面时,尤为明显。从中国经济崛起到“中国奇迹”^[5],国外学者总体上认同这个事实。但他们普遍倾向于把中国经济增长视为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超时劳动”基础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之上。^[6-7]“逐底竞争”论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主要源自廉价劳动力,这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降低劳动报酬、劳动条件来维持竞争力,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贫困和不发展。^[8]实际上,“粗放型增长模式”论和“逐底竞争”论并没有量化中国的劳动强度,更没有严谨地评估劳动强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变动趋势。从这个意义上看,识别劳动强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既是探索适度的劳动强度与经济增长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澄清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动力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劳动强度理论作为支撑。

一、文献述评

回顾现有关于超时加班和过度劳动的研究文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强度研究就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融合的趋势。^[9]其中,(劳工)社会学文献为主,这方面的经济学文献近年来开始涌现。整体来看,劳动强度的经济学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为主^[10-11],其核心思想是工人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根据不同的工资率来灵活地自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12]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与现实并不吻合。经验证据显示,劳动者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预设的自主选择自由,而是在劳动市场上选择已经被用人单位设定好的劳动时间-工资率组合对应的工作岗位。^[13]工人是否会长时间工作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是取决于其个人偏好,而更多是受政策和集体社会经济制度的指导。^[14-15]从理论上讲,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假设了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和成本函数中的劳动是相同的,从而实现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之间的交汇贯通。而事实上,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是劳动力实际完成的劳动量,与成本函数中的劳动并不相同,后者则是雇主向劳动力购买的劳动时间。^[16]鉴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解释力不足,研究劳动强度的社会学文献更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劳动过程理论,^[17-21]以及布雷弗曼的工人去技能化的劳动控制理论和布若威的“制造同意”的劳动主体性理论。^[22-23]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相比,从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研究劳动强度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也更加符合现实,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相当有限的。坚持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的学者其实犯了和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学者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把“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混淆或者等同,认为“过度劳动时间”就是“过度劳动”。^[24-25]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和“劳动支出”是不同的概念。在生产过程中,雇主雇用劳动力投入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劳动榨取的过程。^[26]在特定劳动时间内,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会“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缩短了的工作日才能达到的程度”。^[27]^[472]把“劳动时间”等同于“劳动强度”相当于假设了劳动消耗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是匀质的或者同质的,这显然与实际不符。即使是量化研究的需要,用“劳动时间”度量“劳动强度”也存在较大的测量偏误,这种错误无异于鲍尔斯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家购买的劳动(成本函数中的劳动)等同于工人在生产中实际投入的劳动(生产函数中的劳动)。究其原因,现有文献在理论上只注意到了整体上的劳动过程理论,忽视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内涵的劳动强度理论和劳动榨取思想。^①

^①一个例外是个别研究分税制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其实注意到了每个经济个体的劳动能力是私有信息,因而实际的劳动支出(强度)并不能直接被观测到。这里面就蕴含了劳动榨取的思想,但其并没有进一步打开劳动能力这个黑箱,因而无法揭示作为过程的劳动榨取,参见Golosov et al.的研究^[18]。

本文着重从理论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劳动强度理论的发展,旨在为今后的劳动强度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提供一个理论视角上的备选。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劳动过程理论出发,本文则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内涵的劳动榨取思想,阐释了一个系统的劳动强度理论,从而为深入地研究劳动强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第二,现有关于过度劳动的综述性评论,^{[15][25][29][30]}要么是经验研究的汇总,要么是社会学视角的个体、组织、制度层面的归因,缺少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审视,更重要的是它们混淆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以劳动时间的多少度量劳动强度,忽视了劳动消耗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异质性。本文阐释的劳动强度理论则明确地区分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支出)两个概念。第三,本文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为劳动强度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一种测算劳动强度的新方法。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测度劳动强度:一是肖尔在宏观经济设定下利用劳动强度的实际测量情况对生产过程进行的研究,是一种直接测度方法;^[31]二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和韦斯科普夫构造的间接测度方法,^[32-33]主要适用于微观企业层面,即把劳动强度设定为预期失业损失、监督劳动与生产性劳动之比、由于偷懒被解雇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函数。直接法受限于实验条件,间接法的应用范围更广。

文章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第三部分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工资理论为参照,评述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进展,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批判分析,提出了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的思路;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展望。

二、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强度是一个关键概念。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34][300]}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强度和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关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7]52}社会平均劳动强度为(单个)企业提供了一个参照系,^[35]不过,该参照系于资本家来说仅是一个最低阈值。“资本家力图把劳动强度尽可能提高到最低限量以上,并且力图在一定时间内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因为超过平均强度的任何劳动强度都会给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36]466}简言之,马克思所说“提高劳动强度”,特指企业的劳动强度超过了社会正常的平均劳动强度。^[37]而劳动强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可以通过价值形式的剩余价值率 s 揭示,即 $s=(e-w)/w$ 。其中, e 表示工人付出的劳动, w 表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价值率 s ,既可以在 w 不变的条件下提高 e ,也可以在 e 不变的条件下减少 w ,前者对应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对应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①不过,这种划分属于纯理论意义上的,在现实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常是共存的,而不是相互分割的。^[41]“当法律使资本不能永远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27]480}但是,资本家通过把劳动强度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具有时效性,当“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27]600}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阈中,劳动强度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国别性。“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

^①关于劳动强度提高带来的剩余价值归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界存有争议,可参考洪远朋^[38],黎小波、陈秀山^[39],石启志^[40]。

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上的应用有所变化”。^{[27]600}“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27]645}

关于劳动强度,马克思首先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即“劳动的浓缩”或者“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等于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X”。^{[42]44-45}而后,马克思对这个定义做了进一步地补充:“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缩短了的工作日才能达到的程度”。^{[27]472}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27]599+645}正是劳动强度增加了计量劳动时间的尺度,“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27]472}马克思把劳动的持续时间看作是劳动的“外延量”,把劳动强度看作是劳动的“密度”,后者有时也称为劳动的“速度”或“内含量”。^[40]

资本家之所以能灵活地把劳动的“密度”转化为劳动的“外延量”,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27]204}资本在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后,就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的合法的自由支配权。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资本家——引者注)来鞣”。^{[27]205}“资本家在劳动过程的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量延长劳动过程的长度,在劳动过程的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可能提高劳动过程的强度。资本家强制工人把自己的正常劳动强度提高到尽可能高的程度;而且,资本家强制工人尽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过程延长到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上”。^{[36]466-467}但是,劳动力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其具有主体性。“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这是奴役过程”。^{[36]469}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抗拒和不满直接影响其劳动的努力程度,从而给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榨取带来了不确定性。为减弱这种不确定性,资本家通过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挖掘工人对资本的适应性和其劳动的潜力。总的来说,资本家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达到这个目标。第一,通过技术创新,引入新的机器设备。“不延长工作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从而使得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43]378}第二,通过组织创新,加强对工人的监督。“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必须在实际生产中执行相应的职能,而其活动实际上获得了特殊的多样的内容”。^{[36]469}资本家不仅从生产流程设计上防止工人“磨洋工”,还通过监督活动发挥“解雇”的威胁震慑作用。

三、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进展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强度的研究进展不大,这与劳动过程的研究进展有关。马克思之后的劳动过程研究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直到布雷弗曼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问世,劳动过程研究才得以复兴。^[44]但是,就劳动强度的研究来说,布雷弗曼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分析而提出新的见解。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其观点均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手段局限为强制(coercion)的手段。对此,布若威认为,“强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赶工游戏”(比如,工人设法超额完成配额),因为即使在工人的基本雇佣权利已经得到法律的保障、失业或生存工资不再与工人劳动的努力程度挂钩的情况下,工人仍然会奋力“赶工”,不仅认同管理者的期许,而且经常寻找新诀窍以达

到管理者的目标。在布若威看来,企业的生产行为是由一种自发的、同意的元素和“强制”共同塑造的结果。同时,布若威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划分为专制型和霸权型两种类型。在专制型生产组织中,强制的成分大于同意,劳动的支出对工人的工资进而生存和企业本身的生存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霸权制型生产组织中,同意的成分大于强制,劳动的支出对工人的工资进而生存只具有微弱影响,企业自身能够隔绝于市场或控制市场。^[23]布若威对“制造同意”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思想史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引发了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45]

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无疑为研究劳动强度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46]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鲍尔斯等提出劳动榨取模型(labor extraction model)或劳动纪律模型(labor discipline model),^{[32][4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强度的研究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鲍尔斯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资本家和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实际是一个不完全契约,合同无法规定工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多少劳动,资本家也无法确定工人是否保质保量地履行了合同。为了把所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有效的劳动支出,使单位工资的劳动支出(e/w)最大化,资本家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管理方式,一方面以奖金、加班费、计件工资和晋升等方式激励工人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以“解雇”威胁和惩罚偷懒的工人。在模型中,鲍尔斯等人把工人的劳动支出(e)设定为名义工资(w)、监督劳动(m)和失业后的境况(z)的函数,即劳动的努力函数为 $e=e(w; m; z)$ 。

当然,劳动强度研究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利,也不像部分学者^[48]认为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对劳动强度的研究。虽然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早于索罗的“效率工资理论”^[49],然而,索罗对劳动强度的研究精度高于布雷弗曼,并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效率工资的理论起点。其效率工资模型依赖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工人有偷懒的动机;第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努力程度(e)与工资有关。第一个假设的理论基础可以溯源到阿克洛夫关于劳动力市场中雇主-雇员信息不对称的思想^[50]和阿尔钦、德姆塞茨关于监督-偷懒的思想,^[51]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特别是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异。^[52]第二个假设的理论基础同样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即布若威的生产政治理论。不过,索罗假设的劳动支出与工资之间的强关联只适用于所谓的“专制型”生产组织,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简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索罗的效率工资理论其实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底色”。在索罗的效率工资模型中,工人的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实际工资(w)的单调递增函数,即 $e=e(w)$ 。而在索罗之后,效率工资模型的发展均是围绕着努力函数的设定展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克洛夫、耶伦的公平工资模型(1988)^[53]和夏皮罗、斯蒂格利茨的总工模型(1984)。^[54]不同于索罗模型把工人的努力程度看作是绝对工资的函数,阿克洛夫和耶伦引入了社会习俗的思想,认为工人的努力程度主要取决于相对工资水平,参照系是社会习俗形成的公平工资(w^*),劳动的努力函数为 $e=\min(w/w^*, 1)$ 。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的建模思路则与鲍尔斯的劳动榨取模型是一致的,出发点都是“工人劳动的努力程度往往不能被完全观察到,因而需要监督防止工人偷懒”的思想。但与劳动榨取模型设定了具体的劳动努力函数不同,总工模型中的劳动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一个常量,即 $e=\{0; \text{正数}\}$ 。^①也就是说,在总工模型中, e 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了完善效率工资理论并使其更具解释力,经济学家试图构建更丰富的劳动努力函数。在罗默给出的一般性效率工资模型中^[55],工人的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工人所在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w)、其他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w^*)和失业率(u)的函数,即 $e=e(w, w^*, u)$ 。在萨默斯的效率工资模型中,^[56]努力函数的设定即是 $e=e(w, w^*, u)$ 的一个特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刘文军构建的效率工资模型。^[57]

①在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的总工模型中,把 e 替换为连续的常量,结果仍然稳健。

总的来说,关于劳动强度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并不丰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推进劳动强度研究的关键是设定符合理论及现实的劳动努力函数。现有的劳动强度函数主要围绕工人的工资水平(包括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雇主的监督、宏观经济形势(如失业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等展开。诚然,影响劳动强度的因素难以穷尽,因此只需抓住几个关键的本质性因素。就劳动强度函数来说,当前研究的一个明显局限在于忽视了对模型解释力至关重要的工人特征,^[55]而工人的人口学特征在相关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会使工人的精神更紧张,体力消耗更大。^[37]因此,“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么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即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27]471}——马克思明确强调劳动强度会受到工人的身体状况和生理限度的制约。布雷弗曼则进一步补充了这个观点,“工人对于强加于他们的退化了的工作形式的敌对情绪,仍是一股地下暗流。只要雇佣条件容许或资本家追求的更大劳动强度超过工人的身心能力限度,它就会冲到地面上来”。^{[22]136}但是,反观关于劳动过程的现有研究,其劳动强度或努力函数均把工人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和生理特征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事实上,理论界和媒体对“超时劳动”的控诉,不仅在于低工资(不含加班费),更在于高劳动强度对工人身心的摧残、甚至由之造成的未老先衰。制造业企业偏好招募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也从侧面说明工人的身体状况是一个关键变量,而工人的年龄能够适宜地捕捉到这些信息。如果说工资能够激励工人主动把劳动潜能转化为有效劳动,那么,工人的身体状况为这个转化施加了一个客观性的约束。可以看出,除了工资(w)以外,工人的年龄(age)也必须纳入劳动强度函数,尤其在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

四、小结与展望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实践“健康中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客观上要求我国在新时代探索与适度劳动强度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这进而要求对劳动强度理论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研究。

本文系统地整合了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并通过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思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由于其固有的理论缺陷而不能深入地揭示过度劳动的形成机理,更谈不上给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具有进步性,但同样没有区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蕴涵着深刻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榨取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强度演变趋势的分析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低增长率、低生产率”的长波之中。从劳动时间看,美国1970—1989年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Extreme work hours)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比例达15%,是在代表性样本中最高的;1990年以来,这一比例继续飙升,2000年将近20%。而以高福利国家著称的北欧某些国家,超时劳动(Extreme work hours)的工人比率也逼近5%,^[58]这表明,欧洲经过19世纪“革命的世纪”,已经稳固的工时制度在20世纪和21世纪开始出现了松动。

劳动时间的历史变迁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规律的分析 and 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最有力的手段,那么,他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27]463}相比之下,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作时间的预测则被历史证明是过度乐观

了。在凯恩斯看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在 20 世纪末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时间仅会有每周 15 小时,并且之所以存在这些工作时间,是因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畅意,那么他就必须得干一点工作。”^[59]可见,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演变趋势的理论辩论中,历史的天平实际指向了马克思,而不是凯恩斯。

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劳动强度理论可以和经济增长分析相结合。在全球经济尚没有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中复苏的情况下,2019 年底又遭遇了“新冠肺炎”巨大冲击,全球经济商业活力和生产率进步的黯然失色,重新激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和关注。^[60]然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而新古典生产函数抽象掉了劳动过程,因而,不能研究内生于劳动过程的劳动强度。虽然鲍尔斯等构建了劳动榨取模型,但是,该模型通常被用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失业模型,或纳入劳动纪律的总需求模型,而没有把劳动榨取模型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如果综合劳动榨取模型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就有可能构建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模型。^①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 [1]BURGER A S.Extreme work hou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diverging trends since the 1970s[J].Socio-economic review,2020,18(4):1065-1087.
- [2]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国际劳工组织:全球 36%的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超 48 小时[EB/OL].(2019-04-21)[2021-10-08].https://www.inform.kz/cn/36-48_a3519137.
- [3]马晓伟.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EB/OL].(2020-11-30)[2021-10-0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30/c_1126802833.htm.
- [4]新华社.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EB/OL].(2021-01-10)[2021-10-08].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10/content_5578659.htm.
- [5]刘守英,汪广龙.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J].学术月刊,2021,53(1):48-62.
- [6]KRUGMAN,P.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 1994, 73(6): 62-78.
- [7]PIOVANI, C.Class power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miracle: applying th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to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1980—2007[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4,46(3):331-354.
- [8]LO, DIC.Towards a conception of the systemic impact of China on late development[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0, 41(5):860-880.
- [9]杨河清,王 欣.过劳问题研究的路径与动向[J].经济学动态,2015(8):152-160.
- [10]刘林平,张春泥,陈小娟.农民的效益观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对农民工超时加班的意愿与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9):48-58.
- [11]罗连化,周先波.加班、工作量自主权与效用——兼论工时约束的存在性[J].经济学动态,2019(3):59-73.
- [12]PERLMAN R.Observations on overtime and moonlighting[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66,33(2):237-244.
- [13]冯仕政,李 丁.加班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基于 CGSS2006 的实证研究[J].社会发展,2013(2):163-196.
- [14]BURGOON B, BAXANDALL P.Three worlds of working time: the partisan and welfare politics of work hour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Politics & society, 2004, 32(4):439-473.
- [15]BERG P, BOSCH G, CHAREST J.Working-time configur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iversity across countries [J]. ILR Review,2014,67(3):805-837.
- [16]塞缪尔·鲍尔斯,罗伯特·布瓦耶.工资引导的就业体制——福利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劳动纪律和总需求[J].政治经济学报,2018,11(1):153-174.

^①具体的建模思路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单独进行研究。

- [17]蔡 禾,史宇婷.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空间生产政治与超时加班——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1):14-24.
- [18]庄家焱.从被管理的手到被管理的心——劳动过程视野下的加班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33(3):74-91+243-244.
- [19]庄家焱,韩心茹.精细化管理与金融从业人员加班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8):22-28.
- [20]CÁRDENAS L,VILLANUEVA P.Challenging the working time reduction and wages trade-off:A simulation for the Spanish economy[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1,45(2):333-351.
- [21]MOOS K 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British Factory Act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1,45(1):61-84.
- [22]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23]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24]孙文凯,王格非.流动人口社会身份认同、过度劳动与城乡差异[J].经济学动态,2020(9):96-110.
- [25]杨河清,王 欣.过劳问题研究的路径与动向[J].经济学动态,2015(8):152-160.
- [26]BOWLES 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16-36.
-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8]GOLOSOV M,KOCHERLAKOTA N, TSYVINSKI A.Optimal indirect and capital taxa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3):569-587.
- [29]孟续铎.劳动者过度劳动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3):29-35.
- [30]石建忠.过度劳动理论与实践——国外经验、中国现状和研究展望[J].人口与经济,2019(2):105-118.
- [31]SCHOR,J.B.Does Work Intensity Respond to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Evidence From British manufacturing,1970-1986[R].Harvard Institu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1379,1988.
- [32]BOWLES 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16-36.
- [33]WEISSKOPF T E,BOWLES S, GORDON D M.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3,(2):381-450.
-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5]徐久刚,夏慧玲.论劳动强度及其发展趋势[J].经济问题,1987(8):28-30.
-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7]陈谋箴.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价值[J].中国经济问题,1983(4):42-47.
- [38]洪远朋.由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J].教学与研究,1980(4):54.
- [39]黎小波,陈秀山.由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仅仅属于相对剩余价值吗?——与洪远朋同志商榷[J].教学与研究,1981(1):76-77+53.
- [40]石启志.提高劳动强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生产方法——读《资本论》札记[J].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25-30.
- [41]张 宇,谢富胜,刘凤义.中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4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8.
- [44]谢富胜,宋宪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从缺失到复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0):74-83.
- [45]谢富胜,李钟瑾.主体性与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J].教学与研究,2013(5):31-38.
- [46]高 岭,卢 荻.马克思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纲要——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学说的拓展[J].政治经济学报,2019,14(1):95-123.

- [47]BOWLES S,BOYER R.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 a macroeconomic mode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78(2):395-400.
- [48]刘昌用. 劳动强度理论探索[D].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2002.
- [49]SOLOW R M.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acroeconomic theory:a partial view[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 339-354.
- [50]AKERLOF G A.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 84(3):488-500.
- [51]ALCHIAN A A,DEMSETZ H.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 62(5):777-795.
- [52]袁志刚,陆 铭.效率工资理论述评[J].经济科学,1997(6):38-47.
- [53]AKERLOF G A,YELLEN J L.Fairness and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78(2):44-49.
- [54]SHAPIRO C,STIGLITZ J E.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3):433-444.
- [55]刘文军.效率工资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23(3):83-88.
- [56]SUMMERS L H.Relative wages,efficiency wages,and keynesian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383-388.
- [57]刘文军.效率工资的必要条件与经济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10):40-46.
- [58]BURGER A S.Extreme work hou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Diverging trends since the 1970s[J].Socio-Economic review, 2020, 18(4): 1065-1087.
- [59]KEYNES,J M.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In:Essays in Persuasion[M].Palgrave Macmillan,London, 2010:321-332.
- [60]GERTLER M, KLENOW P J.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growth[R].NBER Reporter, 2019 (2):1-13.

(收稿日期: 2022—02—19 责任编辑: 张 鹏)

Marx's Theory of Labor Intens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Gao ling, Zhai Run-zhuo, Tang Yu-yin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century" of the 19th century, overtime labor emerg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swept across many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cluding northern Europe, known for its high welfare. The prevalence of overtime labor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urgently requi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e existing labor suppl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labor times" and "labor intensity", while Marx's labor process theory contains profound ideas of labor intensity and labor extra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Marx's classic labor intensity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abor intensity theory after Marx, puts forward a return to Marx's labor intensity theory modeling idea. This paper combines Marx's theory of labor intensity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o construct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labor intensity, and is expected to explor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ate labor intensity.

Key Words: Labor Intensity; Labor Tim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Healthy China